



唐·德里罗小说中的 后现代伦理意识研究

Postmodern Ethical Consciousness in
Don DeLillo's Fiction

朱荣华 著

禁书外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唐·德里罗小说中的 后现代伦理意识研究

Postmodern Ethical Consciousness in
Don DeLillo's Fiction

朱荣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德里罗小说中的后现代伦理意识研究/朱荣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 - 7 - 5203 - 2625 - 4

I. ①唐… II. ①朱… III. ①小说研究—美国—现代 IV. ①I712. 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780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65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节 德里罗小说国内外研究现状	(4)
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论点、理论框架及主要内容	(18)
第一章 后工业时代的自我焦虑:《白噪音》中的身份伦理	(32)
第一节 死亡恐惧与自我危机	(33)
第二节 走向反常与断裂状态的个人主义	(45)
第三节 超越自我的樊篱	(53)
第二章 重塑现代主义者的沉默:《毛二》中的写作伦理	(60)
第一节 后现代文化场域中的作家身份危机	(61)
第二节 审美性伦理观下的写作困境	(68)
第三节 后现代写作伦理的建构	(77)
第三章 寻找走向和平的生态技术:《地下世界》中的 技术伦理	(85)
第一节 二元思维的整体性与技术理性的上升	(86)
第二节 垃圾、慢性暴力及技术的非正义性	(94)
第三节 和平人士、自然与艺术家的“言说”	(104)
第四章 为了活着而诉说、活着是为了诉说:《身体艺术家》中的 创伤伦理	(115)
第一节 历史性创伤与结构性创伤	(117)
第二节 异托邦、时间和创伤记忆	(125)
第三节 见证与诉说创伤	(132)

第五章 难以同化的他者：《国际大都市》中的全球化伦理	(141)
第一节 作为全球资本主义霸权象征的埃里克·帕克	(142)
第二节 埃里克·帕克的“物时间”及其排他性	(148)
第三节 身体时间与埃里克·帕克的救赎	(154)
第六章 美国例外论的破灭：德里罗后“9·11”小说中的 共存伦理	(168)
第一节 “9·11”：从个体创伤到美国文化创伤	(170)
第二节 美国例外论中的生命政治	(181)
第三节 柔脆生命与共存伦理的建构	(190)
结语	(200)
参考文献	(205)
文中主要批评家姓名中外文对照表	(227)
后记	(231)

绪　　言

在一次接受采访中，当美国著名小说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 1936—）被问及《毛二》（*Mao II*）中那个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小说家比尔·葛雷是否以他自己为原型时，他当场否认了这一点。他回答说：“不，比尔·葛雷并非以我的生活或工作为模型。我并不是个隐士。”^① 的确，尽管他很少出席签售仪式，在脱口秀栏目、新书推广活动或大学讲坛等场面也很少露面，但收集在《与德里罗对话》一书中各个时期的访谈间接地证明他不是一位像 J. D. 塞林格或托马斯·品钦那样的避世作家。^② 在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心中，德里罗位列当今美国四大重要小说家之一（其他三位是菲利普·罗斯、科麦克·迈卡锡和托马斯·品钦）。他精力充沛、才华横溢，除了现有的 17 部小说〔包括他在 1980 年与他人合作易名（用的名字为“Cleo Birdwell”）发表的《亚马逊族》（*Amazons*）〕，他还涉足短篇小说、戏剧、影视剧本及散文等体裁。目前，他已赢得了世界声誉。首先，包括《白噪音》（*White Noise*）、《天秤星座》（*Libra*）和《地下世界》（*Underworld*）在内的三部小说跻身 2006 年《纽约时报》评选的“过去 25 年来美国最优秀小说”前 20 位。其中，《地下世界》得票数仅次于托尼·莫里森的《宠儿》，位列第二。除此殊荣之外，他还先后获得过美国全国图书奖、笔会/福克纳奖等奖项。当然，给他带来最大声誉的是《地下世界》。这部小说不仅帮助他获得威廉·迪·豪维尔斯奖章、“卡多·巴凯利”国际奖及其他荣誉，而且还让他在 1999 年成为第一个获得“耶路撒冷奖”的美国作家。除此之外，另外三项值得在此强调的荣誉包括他 2009 年获得的“共同财富杰出服务奖”中的文学奖项、2014 年的诺曼·梅勒终身成就奖和 2015 年由国家图书奖颁

① Maria Nadotti, “An Interview with Don DeLillo”, in Thomas DePietro, ed., *Conversations with Don DeLillo*,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5, p. 111.

② 早在 1998 年，董鼎山撰写《遁世作家笔下的底层社会——介绍唐·狄里洛新作》一文向中国读者介绍德里罗时，把他视为同塞林格一样的“遁世作家”。

2 唐·德里罗小说中的后现代伦理意识研究

发的杰出贡献奖。这诸多的奖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同 V. S. 奈保尔、米兰·昆德拉、奥罕·帕慕克、威廉·福克纳、托尼·莫里森或索尔·贝娄等人一样，已成为国际文坛无法绕开的重要作家。当然，这些奖项只是证明其文学声誉的一方面。另一点足以说明他在美国文学研究中重要性的是来自世界各地学者对他的关注。自从 1975 年出现第一篇讨论他创作的文章及 1987 年汤姆·勒克莱尔（Tom LeClair）出版第一部研究他的专著以来，几乎每年都有关于他的评论文章及专著发表。据“德里罗研究协会”（The Don DeLillo Society）网站统计，截至 2016 年 8 月，有关他的研究专著达数十本，另有数百本书辟专章讨论他的作品。另外，像《现代小说研究》《南太平洋季刊》等几家著名学术期刊还相继推出研究他的专刊，而散见于各大期刊中的文章更是不胜枚举。

在中国，德里罗研究经历了逐渐起步到持续升温阶段，研究成果数量与质量也在不断地增多和提高，见证了一位重要作家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落户扎根的过程。笔者 2016 年 8 月以“德里罗”为主题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检索，发现大致可以把 2010 年视为中国德里罗研究发展的分界线。在 2010 年以前，剔除明显与德里罗作品关系不大的篇章，找到期刊文章 42 篇，硕士学位论文 30 篇，还有一篇专辟章节讨论《白噪音》和一篇专辟章节讨论《天秤星座》的博士学位论文。^① 在所有文章中，又以讨论《白噪音》的最多。德里罗研究在中国迎来研究高峰是在 2010 年以后。2011—2016 年 8 月期间，发表在期刊上的文章有 137 篇，硕士学位论文有 60 篇，以德里罗为研究专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有 3 篇。最近，由范小玫（2014）撰写的专著《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唐·德里罗小说研究》和张瑞红（2015）撰写的专著《唐·德里罗小说中的媒介文化研究》也相继面世。另外，近年来出版的有关美国文学的专著或论文集也把目光投向了德里罗。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涉及德里罗的主要有以下几本：吴冰与郭棲庆主编的《美国全国图书奖获奖小说评论集》、杨仁敬等著的《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郭继德主编的《美国文学研究》（第四辑）及陈世丹撰写的《美国后现代小说艺术论》。前三本关注的是

^① 当然，这里不排除有些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并没有上传至中国知网。因为笔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数据库中检索到了姜小卫 2007 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博士学位论文《后现代主体的退隐与重构：德里罗小说研究》，该论文也许是最早以德里罗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另外，据笔者了解，北京外国语大学侯毅凌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也选择了《白噪音》作为其中的一章，以分析其中所描写的消费文化现象。

《白噪音》，而《美国后现代小说艺术论》对《天秤星座》进行了专章分析。^① 国内出版的美国文学史也有几部著作介绍了德里罗的创作，这其中包括杨仁敬撰写的《20世纪美国文学史》、王守仁主撰的《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以及毛信德撰写的《美国小说发展史》。就覆盖内容来看，《新编美国文学史》和《美国小说发展史》^② 介绍的内容要广泛些，因为《20世纪美国文学史》把重心放在了《白噪音》上，前两部则对德里罗的几部代表作做了概述。值得注意的是，德里罗作品的中文翻译正在迅速跟进。自1996年以来，译林出版社陆续引进了他的《天秤星座》《名字》《白噪音》《地下世界》《坠落的人》等著作，德里罗绝大多数小说都有了中文译本，这对于扩大德里罗在国人中的受众面、推进德里罗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可以说，国内外德里罗研究正向多维度、多视角迈进。陈慧莲在《二十一世纪美国德里罗研究新走势》中提出，美国学界对德里罗的研究已经突破学科界限，“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等非文学的因素对其作品进行阐释，挖掘文本和历史事件的关系，分析文学和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透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映射，由此产生了多元、复杂的学术思想”。^③ 为了给笔者的研究创新点寻找学理上的支持，本书在阐述相关研究观点和理论框架之前，将聚焦国内外（国外研究以美国为主）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对德里罗的研究，从批评家通常涉及的四个方面来概述德里罗研究的现状。这四个方面包括对德里罗创作风格的讨论、对他作为文化批评者身份的讨论以及对他小说中的语言使用情况和生态意识的讨论。

^① 由于《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收录的关于德里罗的论文整合了杨仁敬与范小玫2003年在《外国文学》发表的论文，因此以下介绍中只选取两位作者的期刊论文作为关注对象。

^② 《美国小说发展史》用了不到两页的篇幅介绍德里罗。但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其中存在一些纰漏之处。如在介绍《白噪音》时，文中说杰克“有过三次失败的婚姻”（第503页），而实际上应该是四次（其中第四次是与第一任妻子复婚）。另外，小说交代说杰克在毒气泄漏事件中不小心暴露在外，存留在他体内的毒物有让他死去的危险，但具体时间并不确定，因为真正结果有可能得等15—30年才能知道。但《美国小说发展史》中却肯定地说杰克“发现自己不久即将死去”（第503页）。在介绍《毛二》时，该书说这是一部“以20世纪后半期美国特工在世界各国活动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第504页）。这一点与小说情况并不吻合。最后，该书还提到德里罗已有“19部长篇小说”（第504页）。实际上，即使加上他易名与他人合作的小说《亚马逊族》，德里罗到2010年共计发表16部长篇小说。而如果把该书出版时间考虑在内（2004年），德里罗当时共创作的小说是14部。因为《坠落的人》发表于2007年，《欧米伽点》在2010年才出版，而《K氏摄氏度》出版于2016年。

^③ 陈慧莲：《二十一世纪美国德里罗研究新走势》，《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5期。

第一节 德里罗小说国内外研究现状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早在 1984 年评论德里罗的小说《名字》(The Names)时就说过，德里罗在“美国后现代小说家中最有趣、最有才华”。^① 对这一标签，响应者很多，反对者也不少。例如，1998 年出版的《后现代美国小说：诺顿选集》就把德里罗作为一位重要代表作家收入其中，而在弗兰克·伦特里基亚(Frank Lentricchia)看来，德里罗是“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② 这种针锋相对的观点非常明显地反映在 2008 年出版的《唐·德里罗剑桥指南》一书中，该书的第一部分“审美与文化影响”并置了两篇对德里罗创作风格持不同观点的文章。在开篇题名为《德里罗与现代主义》一文中，菲利普·内尔(Philip Nel)尽管语气委婉，但特别强调了现代主义对德里罗的影响。他认为，“因为德里罗在世俗生活中寻求史诗、采用现代主义先锋派创作手法、行文精练节制、小说指涉丰富，所以要理解德里罗的成就，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至少同等重要”。^③ 他不仅指出德里罗自第一部小说《美国志》(Americana)面世以来就一直受到乔伊斯的小说如《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等的影响，而且把德里罗“百科全书式的雄心”与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这一传统联系在一起。为了更有力地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论述了德里罗对缺乏深度和平面化的后现代文化的批评、现代主义式的语言以及他在小说中对艺术家的重视。他尤其详述了现代主义对德里罗语言使用的影响：首先，他把德里罗在《名字》一书中“纸上留下空白”的手法与在《地下世界》前言部分对“和”字的频繁使用追溯到海明威的影响。其次，他仔细研究了德里罗对“原初语言或人类堕落之前语言”的信仰，认为这与一些现代主义者对原始主义的支持异曲同工。另外，他把德里罗对“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者试图跨越词与世界的距离所做努力”的执迷与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那句名言——“思想仅寄寓于

^① Tom LeClair, *In the Loop: Don DeLillo and the Systems Novel*,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 p. 15.

^② Frank Lentricchia, “Introduction”, in Frank Lentricchia, ed., *New Essays on White Noi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4.

^③ Philip Nel, “DeLillo and Modernism”, in John N. Duvall,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on DeLill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3.

事物中”(No ideas/but in things)——联系在一起。最后，他还点明了现代主义“顿悟”手法对德里罗语言使用的影响。其实，关于德里罗的语言使用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内尔在2002年发表的一篇讨论《身体艺术家》的论文中就展开过详述。他认为，德里罗通过响应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浪花》以及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美学原则，使该小说趋向于“形式现代主义”。^①当然，指出德里罗与乔伊斯之间不解之缘的不止内尔一人。在众多强调现代主义对德里罗影响的批评者中，马克·奥斯廷（Mark Osteen）在诸如《回声的宅子：埋葬〈身体艺术家〉》及《德里罗笔下迪达勒斯式的艺术家》等论文中都表述了德里罗如何受惠于乔伊斯。

与内尔不同，彼得·奈特（Peter Knight）在《唐·德里罗剑桥指南》第二篇文章《德里罗、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中突出了德里罗的后现代风格。他把德里罗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受到关注归因于“德里罗代表了美国文学的后现代主义转向”。^②他并不认为德里罗小说中的艺术家是现代主义式的英雄形象。相反，他在文中写道：在德里罗小说中有种“普遍的认识，即在消费主义无处不在的时代，艺术家的作用是有问题的”。^③他进而涉及现代主义之后文学创作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原创性问题。早在《文学的枯竭》一文中，约翰·巴思就论述说，由于时代语境的变迁，包括史诗在内的几种曾经辉煌的文学形式已耗尽，现代主义之后的作家如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写作时总是有种自省意识。他说，博尔赫斯的原创性在于他已认识到“创作原创性的作品已经很难，或许已不必要”。^④这些作家因而不再写作传统的那种“恰当、天真的小说”，而是写作“模仿其他文献作品的小说”。^⑤这种对经典作品再创造的技法后来被冠以“元小说”的名称。在莫莉·海特（Molly Hite）看来，“元小说”技法与打破体裁常规、作者面具、老套的人物形象及高尚与通俗话语相混淆等手法共同构成了后现代小说写作的特点^⑥，而在她用

^① Philip Nel, “Don DeLillo’s Return to Form: The Modernist Poetics of *The Body Artist*”,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Vol. 43, No. 4, 2002, p. 736.

^② Peter Knight, “DeLillo, Postmodernism, Postmodernity”, in John N. Duvall,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on DeLill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7.

^③ Ibid. , p. 29.

^④ John Barth, *The Friday Book: Essays and Other Nonfiction*, New York: Putnam’s, 1984, p. 69.

^⑤ Ibid. , p. 72.

^⑥ Molly Hite, “Postmodern Fiction”, in Emory Elliott,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ov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702–706.

来佐证的代表作家中就有德里罗。似乎是为了证实巴思与海特所言不假，彼得·奈特在德里罗的小说中找出了互文性、打破体裁常规等技法。并且，除论证德里罗小说中的人物塑造缺乏创新意义外，奈特还认为，德里罗已经认识到，“艺术已经无法再现生活本身，只是其他表征的表征”。^①

相比较而言，彼得·奈特的论点比菲利普·内尔的观点在中国得到了更多的响应。在一些讨论德里罗风格的文章中，大多数研究者突出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李淑言（2001）在《唐·德里罗的〈白噪音〉与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就列举了《白噪音》文体上的后现代主义特点，其中包括松散的情节、类型化趋势的人物以及体裁和文体上的杂烩。杨仁敬认为，《白噪音》“是一部有趣的黑色喜剧，它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后现代派的一部力作”。^②与上述两位研究者不同，陈世丹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天秤星座》中的后现代手法。他既看到了小说的多重叙事线索，又详细分析了小说运用的符号嬉戏、时空跳跃、视角变换、重复、拼贴及元小说等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技巧。^③姜小卫虽然也把《天秤星座》归入后现代主义小说之列，但他把重心放在小说对历史的认识上，认为德里罗“以精湛的艺术成就对后现代历史‘认识型’的范式转变以及后现代主体性、自我和社会身份认同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和思考”。^④

另外，有些评论者在把德里罗定位为一名后现代作家的同时，特别关注其他文学潮流对他的影响。德里罗也因此被贴上了“后现代自然主义作家”“后现代浪漫主义作家”及“后现代现实主义作家”等标签。保罗·奇韦洛（Paul Civello）在他的论著中，经过分析德里罗的小说《端线区》（*End Zone*）与《天秤星座》，认为德里罗对自然主义进行了后现代重构。他解释说，不同于左拉、弗兰克·诺里斯等19世纪自然主义作家，德里罗在小说中融入了新的物理与系统理论。因此，在他的小说中，以往那种以“因果科学范式”为特征的世界秩序被以“系统相互连接”

^① Peter Knight, “DeLillo, Postmodernism, Postmodernity”, in John N Duvall,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on DeLill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0.

^② 杨仁敬：《20世纪美国文学史》，青岛出版社2000年版，第732页。

^③ 陈世丹收录此文的《美国后现代小说艺术论》一书，后来经过一些调整与完善，历经几次再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经过修订，201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以《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详解》的书名作为教材的形式同时推出了中英文版本（其中的英文版本删除了论述《天秤星座》的章节），从而扩大了美国后现代小说在中国的影响。

^④ 姜小卫：《后现代历史想象的主体：〈天秤星座〉》，《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82页。

为特征的新秩序所替代。在这种新秩序中，他笔下的人物失去了对世界的掌控，因为已经无法找到一个独立于他们之外的“客观”现实。^① 奇韦洛的观点后来在中国找到了共鸣。方成把他的论点运用到解读《白噪音》中，认为“德里罗的小说传承了自然主义小说的主题关注，但又在不同的存在领域——知识、历史、文化、数据——中找到了新的塑型模式”。^② 至于浪漫主义对德里罗创作的影响则被哈罗德·布鲁姆、保罗·莫尔特比（Paul Maltby）及卢·F·卡顿（Lou F. Caton）等评论者挖掘出来。布鲁姆认为，与其称德里罗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不如说更像一个“浪漫主义高峰时期的超验主义者”；^③ 而莫尔特比在德里罗小说中发现了“浪漫主义式的形而上学”。^④ 卡顿通过细读《白噪音》中的三幕场景，认为德里罗在该小说中始终“保持一种浪漫的不确定性”。^⑤ 还有些评论者注意到德里罗近几年——尤其是自发表《身体艺术家》（*The Body Artist*）以来小说创作风格悄然地发生了变化。中国两位学者王守仁和童庆生在《回忆、理解、想象、知识——论美国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一文中，就是以《国际大都市》（*Cosmopolis*）这本小说为其中一例来论述美国文学的后现代现实主义风格的。实际上，王守仁主撰的《新编美国文学史》就把德里罗的创作归入“新现实主义小说”之列，认为“德里罗的长篇小说包含着传统的叙述模式、文笔流畅，不乏幽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⑥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也许能推断出一个结论：批评家总是根据自己的认知范式来定位某位作家，而作家本人也许并不在意自己属于哪一派别。德里罗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对于自己作品被批评家贴上各种标签，德里罗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我不反对他们。但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做。我是一位小说家，一个时期的小说家，一位美国小说家。”^⑦ 事实上，在

^① Paul Civello, *American Literary Naturalism and Its Twentieth-Century Transformation: Frank, Norris, Ernest Hemingway, Don DeLillo*, Athen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4, p. 4.

^② 方成：《后现代小说中自然主义的传承与塑型：唐·德里罗的〈白噪音〉》，《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4期。

^③ Harold Bloom, ed., *Don DeLillo: 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 Broomall: Chelsea House, 2003, p. 2.

^④ Paul Maltby, *The Visionary Moment: A Postmodern Critiqu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p. 47.

^⑤ Lou F. Caton, “Romanticism and the Postmodern Novel: Three Scenes from Don DeLillo's *White Noise*”, *English Language Notes*, Vol. 35, No. 1, 1997, p. 40.

^⑥ 王守仁主撰：《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

^⑦ Maria Nadotti, “An Interview with Don DeLillo”, in Thomas DePietro, ed., *Conversations with Don DeLillo*,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5, p. 115.

德里罗罗列自己喜欢的作家或对他产生过影响的作家中，既有通常被认为属于现代主义的作家又有被当成后现代主义的作家。这其中就有福克纳、乔伊斯、海明威、品钦、威廉·加迪斯及保罗·奥斯特。因此，本书倾向于接受菲利普·内尔的建议。尽管他强调了现代主义传统与德里罗创作的关系，但他在自己文章行将结尾时写道，“任何想确认德里罗诗学特征的努力——是现代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都必须考虑到他小说中隐藏的其他特征”。^① 毕竟，很少有哪位作家是为某一“主义”而创作，而且作家的风格总会随着自己对文学的不同理解而变化的。但评论家的讨论并非没有意义。相反，他们的观点将使读者对某位作家的叙事风格、遣词用句等文体特征更加敏感，增加阅读的乐趣。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于德里罗的小说，绝大多数评论者都认同了一点，那就是德里罗作品“不容置疑的当代性”^②，或者说德里罗对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后现代状况”的关注。哈维曾把1973年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开端，认为当时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由“福特主义向某种可被称为‘灵活’的财富积累制度”^③转变。哈维所说的这个时间点对于考察和研究德里罗小说主题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因为无论从德里罗所有小说发表时间看（第一部小说《美国志》发表于1971年），还是他作品所涉及的时代背景来考虑，他的作品都与哈维所说的社会状况有契合之处。据此，我们或许明白德里罗为何经常被评论者看成是后现代文化的“批评者”。用约翰·N·杜瓦尔（John N. Duvall）的话来说，德里罗的作品是对当今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持续地进行批判”。^④ 关于后现代文化，特里·伊格尔顿曾做出如下描述：“这是西方历史性地转向新的资本主义形式——转向瞬时即变、没有中心的技术世界、消费主义世界以及文化产业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服务、金融和信息产业战胜传统的制造业，古典的等级政治让位于一系列‘身份政治’。”^⑤ 而这些特点在德里罗小说中似乎都能找到例证。勒克莱尔在他的著作中就说过，“德里罗小说……内

^① Philip Nel, “DeLillo and Modernism”, in John N. Duvall,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on DeLill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4–25.

^② Robert Chodat, *Worldly Acts and Sentient Things: The Persistence of Agency From Stein to DeLillo*,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13.

^③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1991, p. 124.

^④ John N. Duvall, “Introduction: From Valparaiso to Jerusalem: DeLillo and the Moment of Canonizatio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Vol. 45, No. 3, 1999, p. 566.

^⑤ Terry Eagleton, *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 Oxford and Malden: Blackwell, 1996, p. vii.

容广泛，它们涉及了美国后工业时代文化的方方面面，这时的美国处于信息与交流时代”。^① 鉴于讨论德里罗小说的后现代文化特征的文章数量过于庞大，本书将以克里斯托弗·道格拉斯（Christopher Douglas）对德里罗小说主题的归纳为基础，进行扼要介绍。克里斯托弗·道格拉斯认为，德里罗小说大体有四大主题：第一是德里罗“对通俗文化的着迷”；第二是“本原感的缺失”；第三是“在历史感消失的同时，对历史语境的渴望”；第四是“恐惧感及怀疑有人设局”。^② 与之相比，本书的介绍将更为具体，下文将侧重德里罗小说对消费主义、媒介及技术的呈现以及他对恐怖主义的描写这两大方面。

在早期研究德里罗小说的著名评论者中，除勒克莱尔之外，另一个无法忽略的是伦特里基亚。尽管在上文中提到，伦特里基亚把德里罗归类于现代主义者行列，但他特别关注德里罗对“后现代境况”的表现。他曾这样说过，“阅读德里罗的著作就是一次异常深刻的文化体验——这些小说都不可能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之前创作出来”。^③ 他对德里罗研究的贡献主要与他主编的两本论文集有关。这两本文集都出版于 1991 年，其中一本为《〈白噪音〉新论》，专门对《白噪音》展开讨论；另一本为《介绍德里罗》，是对 1990 年《南太平洋季刊》推出的德里罗专刊进行收编、拓展的结果。第一本文集中收录了四篇讨论《白噪音》的专题论文。托马斯·J. 费拉罗（Thomas J. Ferraro）在开篇论文中讨论了小说中消费文化所具有的社群性凝聚力量，而保罗·A. 坎托（Paul A. Cantor）接下来以小说中的希特勒研究为例，细探了媒体与学术话语对某一可怕的历史事件具有的稀释淡化的作用。迈克尔·V. 摩西（Michael Valdez Moses）在第三篇文章中则把重心放在小说对充满死亡威胁技术的刻画上。伦特里基亚执笔了最后一篇文章，他认为，德里罗在小说中试图在后现代境况下塑造出一种“新的人类集体形式”。^④ 《介绍德里罗》这本文集虽然突出了“天秤星座”的地位，但覆盖的面比较广。在众多文章中，首先值得推介的是丹尼尔·阿伦（Daniel Aaron）所写的《如何阅读德里罗》。从

^① Tom LeClair, *In the Loop: Don DeLillo and the Systems Novel*,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 p. ix.

^② Christopher Douglas, “Don DeLillo”, in Hans Bertens, and Joseph Natoli, ed., *Postmodernism: The Key Figures*,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2002, pp. 104 – 105.

^③ Frank Lentricchia, “The American Writer as Bad Citizen”, in Frank Lentricchia, ed., *Introducing Don DeLillo*,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

^④ Frank Lentricchia, “Tales of the Electronic Tribe”, in Frank Lentricchia, ed., *New Essays on White Noi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92.

题目就能看出，他试图为德里罗的初读者提供一些便捷之道。他指出了一些德里罗小说经常关心的问题，如“灾难”“阴谋”“风景”“美国”，以及风格上常见的“长篇大论”等。接着，他以《天秤星座》为例，指出了德里罗小说中的其他主题：“技术与人类价值”的关系、“语言与私密”的关系及对“阴谋美学”的关注。该文集中，另有研究者讨论了德里罗对罗曼司这一体裁的运用，讨论了德里罗对“电影真实”的处理。这其中最富有洞察力的文章还是伦特里基亚为此书撰写的压轴之作——《作为后现代批评的〈天秤星座〉》。在该文中，他认为，《天秤星座》开辟了“美国文学与文化的一个新阶段”，因为小说中“典型自然人生活的社会环境”消失了，代之以一个“具有感召力的影像世界”。^① 他以细读为基础，详细展现该小说如何为读者揭示印刷与视觉媒介对日常体验的影响。

但是，全面探讨德里罗在小说中对媒介运用的著作是道格拉斯·基西（Douglas Keesey）的著作《唐·德里罗》。这本发表于1993的著作涵盖了德里罗当时已发表的10部小说，每章以一部小说为主要探讨对象。该书的主旨是要讨论德里罗“对媒介表现现实的密切关注，这些媒介已把人与自然及自身隔离开来”。^② 基西不仅强调了每部小说某一特定的“媒介结构”，而且尽量把它们置入相应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例如，在第五章讨论《拉特纳之星》（Ratner's Star）时，他指出了该小说对数学媒介的运用，以及它对路易斯·卡洛尔、毕达哥拉斯、牛顿和爱因斯坦等人思想的借鉴。该书文笔清新，对德里罗研究者来说，是一本很好的入门教材。根据克里斯蒂娜·斯科特（Christina Scott）的分析，马克·奥斯廷那本颇具分量的研究著作——《美国式的魔力与恐惧：唐·德里罗与文化对话》虽然分析更加细致、学术性更强，但是，在“结构与目标”上都与基西的著作非常相近。^③ 马克·奥斯廷的观点是“德里罗的著作与美国文化制度及其各种话语展开对话，演绎了美国式的魔力与恐惧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层关系具有多种形式、意蕴与后果”。^④ 在全书八章中，他一方面细数由影像侵袭、各种迷恋与“各种宏大叙事碎片化”带来的恐惧，另一方面表明德里罗笔下的人物没有放弃寻找“魔力形式”的努力。他尤其指

^① Frank Lentricchia, “Libra as Postmodern Critique”, in Frank Lentricchia, ed., *Introducing Don DeLillo*,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98.

^② Douglas Keesey, *Don DeLillo*, New York: Twayne, 1993, p. vii.

^③ Christina S. Scott, *Don DeLillo: An Annotated Primary and Secondary Bibliography*, 1971 – 2002, Ph. D. dissertation,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2004, p. 32.

^④ Mark Osteen, *American Magic and Dread: Don DeLillo's Dialogue with Cultur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0, p. 1.

出了《毛二》《地下世界》等作品中艺术家的作用，认为他们正在谱写区别于官方历史的生活篇章。

同道格拉斯·基西类似，马克·奥斯廷在行文中穿插了许多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但在大量关于德里罗研究的著作或论文中，有一位理论家的名字似乎总是出现在读者面前，他就是法国人让·鲍德里亚。根据马克·奥斯廷的调查分析，约翰·弗劳（John Frow）是第一位把德里罗与鲍德里亚联系在一起的批评家。在《最后时刻之前那些最后的事情：关于〈白噪音〉的笔记》一文中，弗劳认为，《白噪音》执着于“建构典型性”。^①他在考察了自柏拉图至德勒兹（Gilles DeLeuze）等批评家对“仿真”理论的阐述后，把《白噪音》与鲍德里亚的理论衔接起来。这一点后来在约翰·杜瓦尔那里得到了深化。在突出小说中由超市、购物中心构成的消费空间与电视形成的概念空间对日常思维渗透的同时，杜瓦尔论述说，《白噪音》中“社会、政治与美学已平面化为让·鲍德里亚所说的仿真”。^②相比之下，伦纳德·威尔科克斯（Leonard Wilcox）的《鲍德里亚、德里罗的〈白噪音〉及英雄叙事的终结》显然把鲍德里亚的理论与德里罗的小说之间的参照性作为一个主题来阐述。更重要的是，他在突出他们之间的相似点时，也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一方面，他认为，德里罗与鲍德里亚对于信息社会里“真实的丧失”“主体性的剧变”以及“英雄般地寻找出路这样的概念已消亡”等方面的认识不谋而合；另一方面，他指出，区别于鲍德里亚，德里罗相信“小说叙事能够对它所描写的过程保持批判的距离与提供批评见解”。^③当然，像迈克尔·斯托金格（Michael Stockinger）和兰迪·莱斯特（Landy Laist）等批评家还利用鲍德里亚的理论来阐释德里罗的其他小说。实际上，也许由于鲍德里亚的理论与德里罗的小说实在有太多契合之处，2008年出版了一部把两者结合起来的专著。在《德里罗、让·鲍德里亚及消费难题》一书中，马克·舒斯特（Marc Schuster）使用了鲍德里亚理论中的许多关键词来阐述德里罗的

^① John Frow, “The Last Things Before the Last: Notes on White Noise”, in Frank Lentricchia, ed., *Introducing Don DeLillo*,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419.

^② John N. Duvall, “The (Super) Marketplace of Images: Television as Unmediated Mediation in DeLillo’s *White Noise*”, in Mark Osteen, ed., *White Noise: Text and Criticism*, New York: Penguin, 1998, p. 433.

^③ Leonard Wilcox, “Baudrillard, DeLillo’s *White Noise*, and the End of Heroic Narrativ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Vol. 32, No. 2, 1991, pp. 346 – 365.